

帝国体制下独立陵园制的发展演变

段清波 刘俊艳

关键词：帝国体制 独立陵园制 社会治理体系 汉文明

KEYWORDS: Imperial Polity Independent Mausoleum Precinct System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Han Civilization

ABSTRACT: The appearance of burials is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and funeral of the people. Along with the complexity of the societies and these two views, the forms and scales of burial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xperiencing corresponding changes. The independent mausoleum precinct system appearing in the late Warring-States Period was conceptualized, formed, firmed and perfected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from feudal polity to imperial polity;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Xin Dynasty (Wang Mang Interregnu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n Culture made the independent mausoleum precinct system a regular rule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two thousand years since. During the evolu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mausoleum precinct syste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such as the terrains of the mausoleum precincts and the personal preferences of the monarchs made this system show differences and distinctions in all of the periods, both of which wer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sequence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hina.

人们对死去亲人的尸体有意识地进行掩埋处理，意味着灵魂不灭的观念已经成熟，该观念指导下的墓葬开始出现。“居室葬”和氏族公共墓地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形态是相适应的，是血缘制下先民原始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等级观念的加深，公共墓地出现公墓与邦墓两种主要形式，逐渐形成与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和身份相匹配的陵墓制度，在墓葬的形态、随葬品的类别和数量、棺椁数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1]。到了战国后期，流行两千年之久的集中公墓制开始被独立陵园制取代；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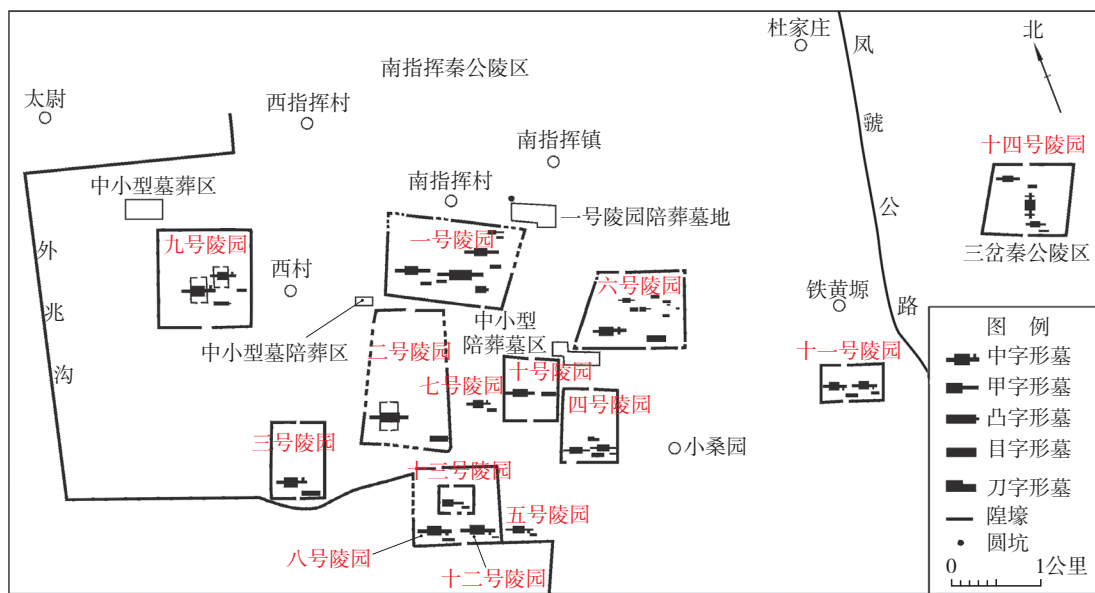
开始出现从王国体制到帝国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在独立陵园制的发展后期，“汉文明”的确立与巩固使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成熟性演变。

一、独立陵园制的确立与完善

商周两代实行集中公墓制的埋葬方式。据文献记载^[2]和考古学观察^[3]来看，所谓集中公墓制，是指王室、诸侯国君与其夫人或宗族成员，死后实行多代集中埋葬在同一公共墓地的制度。集中公墓制对应的是贵族阶层，平民阶层也有自己的墓地，称为邦墓^[4]，公墓与邦墓制对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大致是王

作者：段清波，西安市，710069，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刘俊艳，西安市，710069，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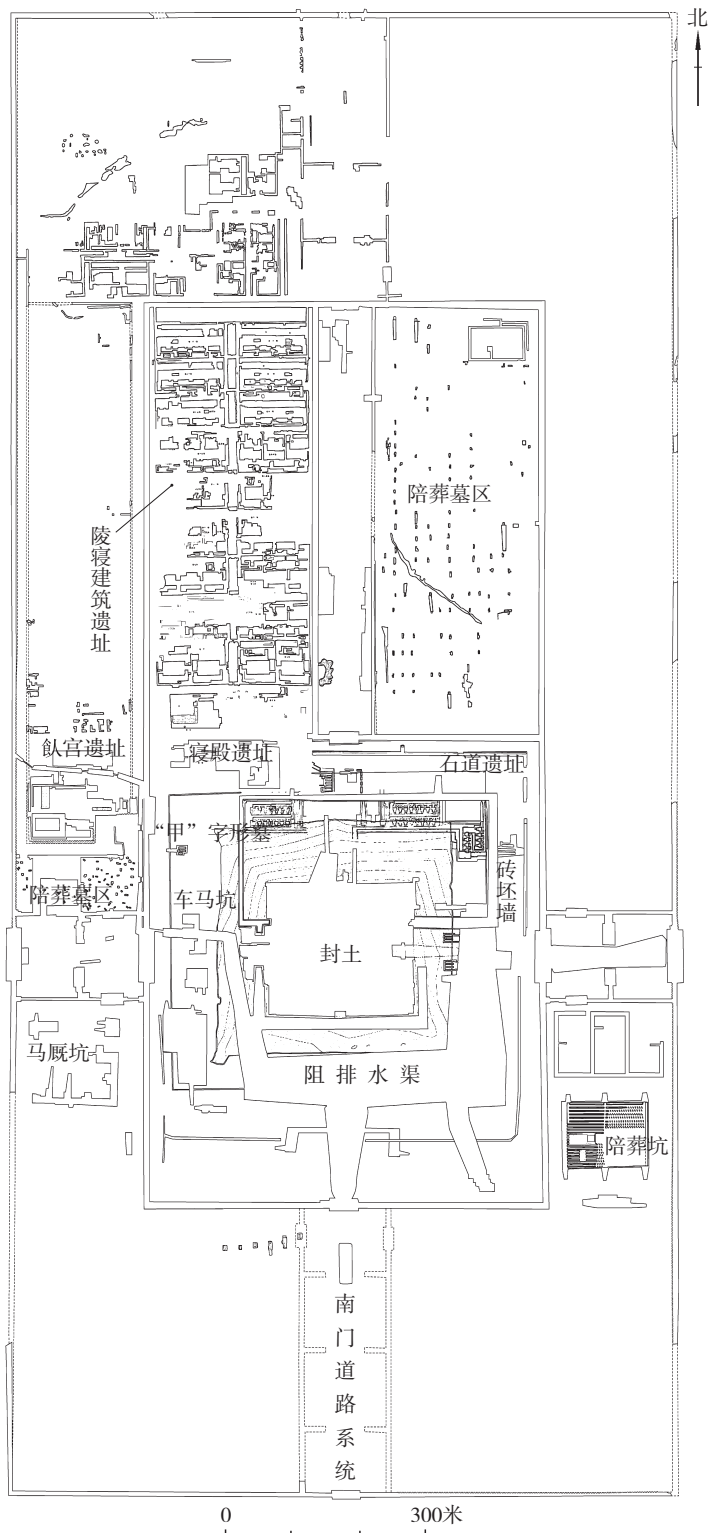
图一 秦公陵园墓葬分布示意图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图二改绘，《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

国制。与“集中公墓制”相比，“独立陵园制”是一种新出现的墓地形态，指的是以一位皇帝为中心规划布局，拥有独自の陵园名称，以垣墙或壕沟等屏障界定出一定规模的陵园范围，并且能够透过墓上建筑，如寝殿、便殿、寺园吏舍、陵邑等，形成一套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墓地制度的陵园建制^[5]，它所对应的是皇帝专制下推行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帝国体制。

春秋时期的雍城秦公墓地以隍壕或兆沟为界表示一定的地理划分，但其整个陵园内包含多代国君，每代国君均拥有相对独立的陵园，各陵园之间相距不远，且尚未有独立名称和相对完备的墓上礼制建筑（图一）。因此，该墓地仅为独立陵园制的萌芽形态。到了战国时期，依旧有部分诸侯国继续实行集中公墓制，但战国中后期的秦王陵园、秦芷阳陵区、中山王陵、赵王陵、辉县魏王陵等国君陵已分散埋葬，除秦芷阳陵区四座陵园皆称“东陵”^[6]，其余列国诸陵均已有了独立的陵园名称、完备的墓上管理体系。可见战国时期应为集中公墓向独立陵园的过渡阶段，战国中后期开始出现独立陵园制^[7]。

战国至秦代的二百多年，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变革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制走向彻底的衰败；新兴势力的崛起，打破了血缘制，以地缘为基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因素逐渐出现。在这一社会治理体系巨变过程中，秦人的区位优势 and 自秦孝公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帮助秦人率先突破体制藩篱。“始皇初即位，穿治郿山，及并天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8]。据文献记载，秦始皇几乎是自即位之初便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经研究，现在看到的秦始皇陵园内外的遗存均是在李斯担任丞相的秦始皇晚期形成的，是伴随着帝国文明、中央集权体制的基本确立，按照新的帝国理念设计和建造的。秦始皇陵园已经完全具备独立陵园所需的四大要素，成为独立陵园制正式确立的标志。而且陵园规模与其陵墓封土一样愈发庞大，可谓厚葬理念“以大为荣”的直观展现。此外，它的选址完全没有为秦帝国后世陵墓位置考虑，尽显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始皇帝唯我独尊的集权意识（图二）。



图二 秦始皇帝陵园遗址总平面图

(据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第226页图10-1改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在帝国社会治理体系形成的初期,与皇帝相关的各类建筑一定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含义。多数学者赞同陵园若都邑的设计理念^[9],这种理念的形成,是秦始皇雄踞天下的思想再现,贯穿着秦始皇希望在全社会快速树立起帝国信念,以及实现有效地对帝国治理、恢复社会秩序和快速强大国家的渴望^[10]。与此同时,作为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民众心中大一统的国家概念尚未成熟;而承载着社会教化示范作用的帝王陵墓,其陵园借助封土、三出阙、外藏系统等要素,能够彰显超越皇帝个人生活之上的帝国理念,强化民众大一统的国家意识^[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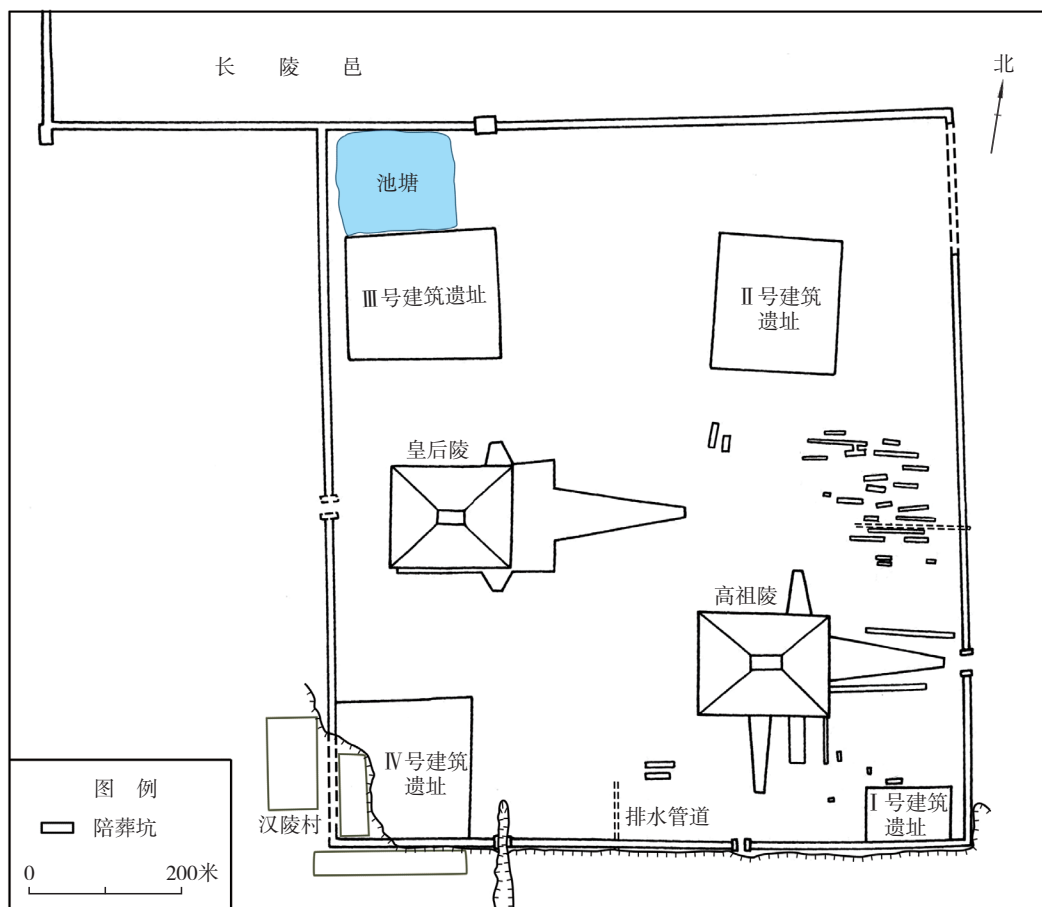
西汉帝陵全方位地继承了秦始皇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包括帝陵陵园的内部设施、布局以及朝向等。

准确地说,秦代与西汉共同面临着制度变革的要求,面对这类挑战,或选择对现有体制的全面重建,或选择建立一个更加封闭的体制来应付^[12]。秦人选择了在商鞅变法基础上创建新的社会治理体系^[13]的做法,但秦始皇过快的变革节奏与社会发展规律相排斥,失败在所难免。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在改革过程中放慢步伐,创造出一种能够容纳社会变革,适应新环境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经过连年的征战,社会需要缓冲,因此,西汉初期直到武帝,采取的是休

养生息的治国方略，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人民的生活也得到改善。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为西汉中期之后的系列变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为了配合汉武帝采取一系列大型行动，君权至上与强化中央集权的要求又一次被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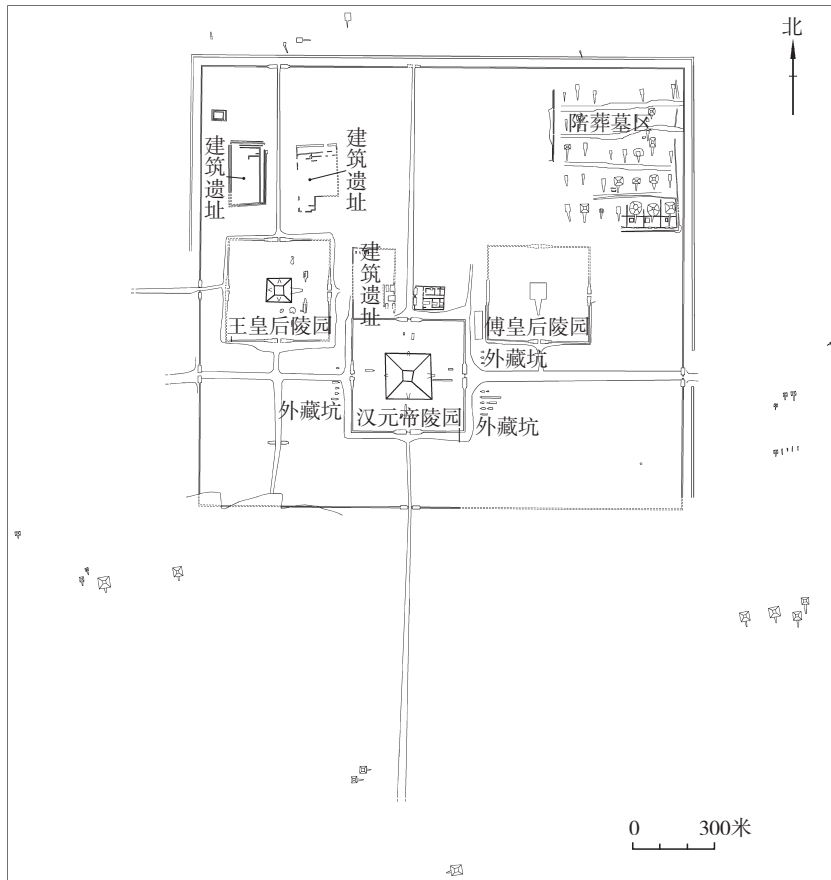
这种不同于秦代的治理体系使得西汉帝陵在承袭秦代陵寝制度的基础上也展现出其独特的面貌。例如，西汉帝陵与秦陵一样都有明确的兆域、独自的名称，以及功能齐全的陵寝制度。西汉早期帝后在一座陵内异穴合葬，帝后陵坐西朝东^[14]，继承了秦陵“崇东”的传统^[15]（图三）。西汉帝陵和陵园的布局受都城建制的影响，帝陵、后陵、陵墓和正门的位置与长安城内的宫殿布局形

制非常接近^[16]。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从景帝阳陵开始，寝殿移到帝、后陵的陵园之外修建，创立了“陵旁立庙”的制度^[17]。陵园附近还有众多的功臣贵族陪葬墓，其中外姓功臣的加入成为西汉帝陵作为独立陵园的一个新的特点^[18]。西汉晚期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对郊祀体系和宗庙体系进行改革，自元帝渭陵开始，陵园及其内部分陪葬墓的方向由东向变为南向^[19]（图四）。西汉晚期的帝陵陵园开始出现具有内外两重墙壕结构的陵园形态。从汉元帝开始，陵园设置的外藏系统观念也开始出现变化，陪葬坑的数量急剧下降，直至东汉时期外藏系统弱化甚至消失；从此阶段开始，陵邑制度彻底消失。



图三 汉高祖长陵园钻探平面图

（据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第8页图三改绘，文物出版社，2010年）



图四 汉元帝渭陵区平面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2013年第11期)

总之,西汉初期、中期及晚期的独立陵园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儒学改造运动的开展等产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与每一个阶段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主导文化的前进相始终,反应的正是不同时期当政者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主流思想。

二、汉文明理念下的独立陵园制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由社会治理体系(政治体制)、宇宙观(思维方式)、核心价值观(行为处事方式)三部分构成的,亦或称“三观”,它们彼此互为因果、相互支撑。三者之间的异同,是不同文明之间最主要的差异。

物化的文明构成要素理念没有全面和

深刻地阐释文明本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一切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事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使社会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运转,全社会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创建出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反映统治者意志,而且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为使这套治理体系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需要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较为完备的,有关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即宇宙观,以及由宇宙

观主导而形成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为保障这套社会治理体系长期、有效、稳定运转,还需要构建出一套能够引导和约束全社会成员行为处事方式的核心价值;核心文化价值观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治理理念和管理目标。历史证明,若三者之间能形成高效有序运转的态势,则表明此体系之下的社会是相对和谐的,反之就会出现动荡。

汉文明是在帝国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以汉字为书写和交流语言,以天地、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规矩为核心价值观即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20]。汉文明最终于西汉后期,尤其是王莽前后得以完全形成。例如,汉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南向理念、轴线意识、

左右对称、南北郊祀等在这一阶段确立，以此为指导的都城规划原则几乎被东汉及以后朝代全盘接受和传承^[21]。“三观”架构下汉文明的重要内容——阴阳五行相克相生的宇宙观^[22]，同样在战国晚期、秦、西汉中晚期、新莽时期不断完善并完全成熟，深刻影响着陵园建制、封土形态、礼制建筑结构等。确切地说，王莽制礼作乐对后世礼制的改革，包括唐礼、宋礼，在格局和精神上都有很大的影响^[23]。西汉晚期汉文明的确立，是东汉之后历朝历代大体沿袭秦、西汉之制，以表明王朝正统地位合法性的依据，其中就包括对独立陵园制的继承和进一步完善。

根据以往对北邙五帝五陵的调查勘探与考古成果^[24]，汉文明的确立深刻影响着东汉帝陵陵寝制度的发展。光武帝原陵陵园和朱仓陵园遗址陵寝的布局及陵墓主墓道朝向、封土形式、神道石刻、陪葬制度等方面都在西汉帝陵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陵园垣墙由行马代替、陵园规模有所减小、新出现“上陵礼”、陵前建祭殿、陵旁建筑悬挂大钟等，完善和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25]。这种变化对东汉以后历代帝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6]，皇帝陵墓在各项国家级祭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些改革的源头，都指向王莽对郊祀及宗庙制度的改革，其背后正是对王莽时期托古改制最终确立下来的“汉文明”的传承。

三、独立陵园制的简化与复兴

经过秦、汉时期的厚葬之后，由于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陵园建制受制于经济基础和军事因素等，自三国开始薄葬之风至少持续到十六国时期，这一阶段的帝陵陵园规模大大缩小，园内的地上建筑趋向简单甚至消失。

文献记载曹操高陵是“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27]，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了高

陵包括内外夯土基槽（内垣墙外壕沟）、神道、东部建筑和南部建筑等五个部分^[28]，整个陵园规模大不如前。自此，薄葬成为其后一段时期内陵墓制度的主导理念^[29]，可以说省减两汉时期的陵寝制度成为三国时期的整体趋势^[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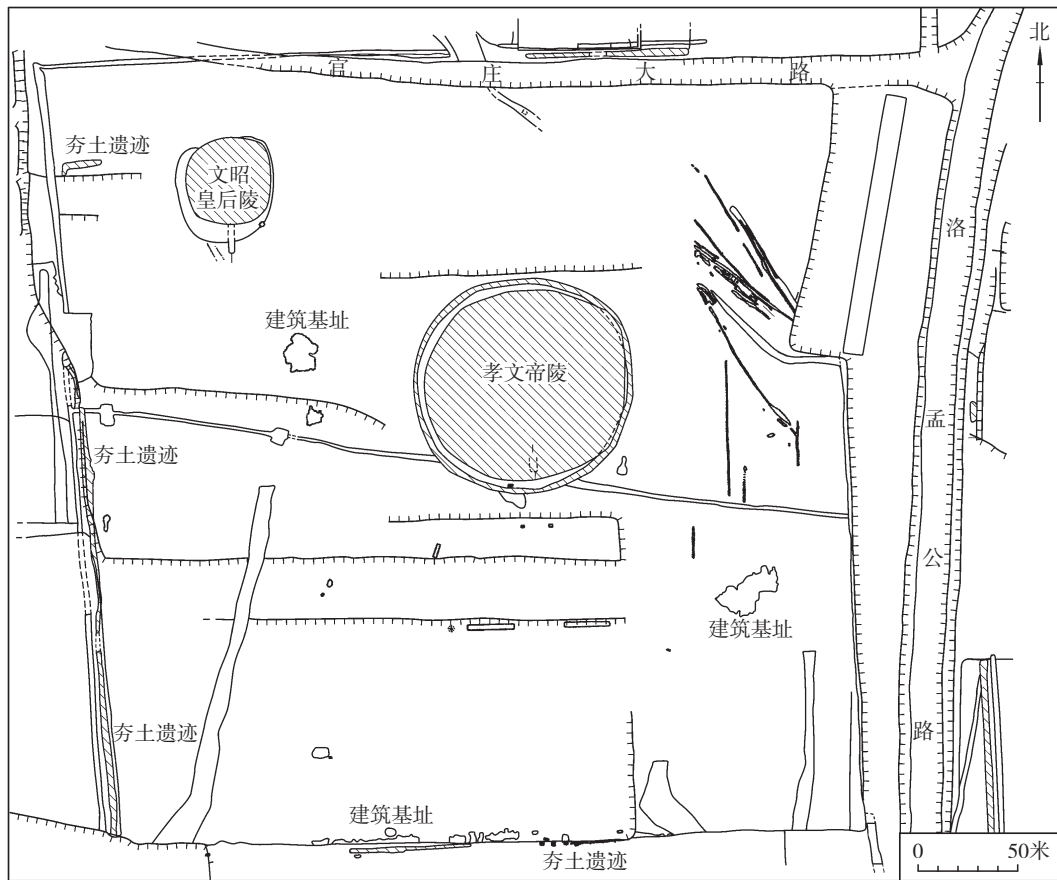
据文献记载，晋宣帝司马懿“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一如遗命”^[31]。经发掘，晋文帝崇阳陵陵园中现存有若干曲尺型建筑遗迹和陵园垣墙，而晋武帝峻阳陵经钻探未见陵园遗迹^[32]。

东晋之时，帝陵基本上是“平葬，不起坟”，地面上不设寝殿^[33]，经发掘也未见有陵园设施^[34]，但这一时期恢复了被西晋取消的上陵礼，只是规模无法与以往相比。进入十六国时期后，各帝陵的陵墓葬制不尽相同，虽然地面上都尚未发现封土、陵园等设施，但就文献记载来看^[35]，并不能完全认定前赵之后不存在陵园等地面设施。

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对峙达到一种暂时的平衡，陵园制度基本得到恢复。这一时期的封土、陵园、神道石刻等全面复兴，在地面设施方面突破了魏晋墓制。

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地区之后，政局逐渐稳定，出现了一套以汉文明为主，融入鲜卑风格的陵墓制度，如陵墓有高大封土，陵前建有上陵拜谒之所，以皇陵为中心营建“山园”，在陵前立祠庙，都是汉化的影响^[36]。而北魏将北邙墓地作为鲜卑各族集体安葬之地，以及“凿石为祖宗之庙”则是沿袭鲜卑族原来族葬的习俗。此外，其陵墓建制还结合了佛教的信仰，陵园内有佛寺、斋室等建筑（图五）。

东魏北齐的陵园地面建制和墓葬制度总体上沿袭了北魏陵墓之制。东魏西陵的陵园垣墙基址犹存，封土以南还存有部分建筑基址；北齐仅有武宁陵已被发掘，其地面设施有封土、神道、石人等，尚未发现陵园围



图五 北魏孝文帝长陵园布局示意图
(据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和钻探》图三改绘,《文物》2005年第7期)

墙^[37]。西魏文帝永陵、宇文泰的成陵和北周孝陵,是否存在陵园等设施目前尚不清楚。

南朝四代的十余座帝陵基本都被破坏过,至今未发现有陵园墙^[38],设有寝庙类建筑也仅见于文献记载中^[39]。总体而言,南朝陵墓基本沿袭了东汉以来的制度,陵前安置石刻,常有祭陵活动等。由于陵墓大多依山而建,陵园的方向基本依照山势决定^[40]。此外,聚族而葬也是南朝帝王陵墓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41]。

通过对比魏晋与南北朝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和墓室结构,不难发现,后者对前者的薄葬理念仍有沿袭^[42]。但就帝陵陵园建制而言,南北朝已经摆脱了魏晋之制的束缚重开厚葬之风,这对其后的帝国陵园产生了较大

影响。

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泰陵^[43],陵墓在仿汉制预营寿宫、以城垣为界、陵旁立庙的同时,亦汲取了南北朝的部分陵墓制度,如建造奉陵寺庙等^[44]。位于江苏扬州的隋炀帝墓,经发掘该墓并无陵园迹象^[45]。

总之,自南北朝发展至隋代,陵寝制度已然彻底恢复,为接下来帝国文明进程中又一个辉煌时代下帝陵陵墓制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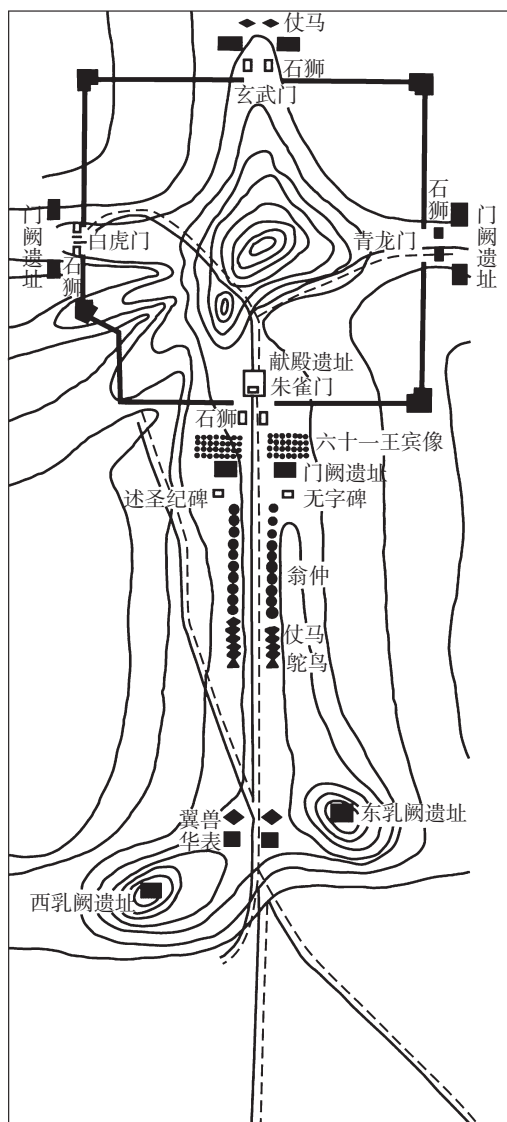
四、独立陵园制的传承与创新

唐代帝陵有封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形制,其陵园建制基本效仿两汉之制,坐北朝南,各陵均有独立的兆域规划、陵墓建筑,

且四周均有围墙，不同之处在于寝宫地位下降、献殿地位凸显（图六）。有学者认为唐陵陵园建筑布局仿长安城而建，皇城、宫城、外廓城都有对应区域^[46]。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唐代帝陵规模减小，气势不复往昔。五代十国陵墓沿袭唐代旧制，但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力量限制，陵墓的规模气势远不及唐陵，加上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仅有部分帝陵园尚有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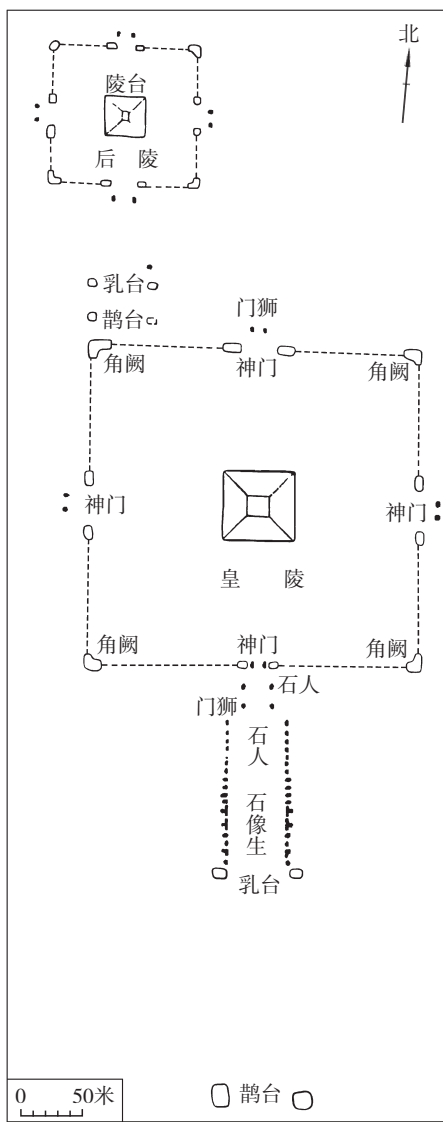
可寻^[47]，且在陵园建制方面没有大的变革。

北宋时期的陵寝制度相较于五代十国有所恢复，如陵园平面呈方形、神门四开、封土为陵、上下宫分立等^[48]；其陵园基本布局和建制在两汉、唐代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诸如取消预作寿陵、下宫居上宫西北等^[49]（图七）。南宋皇陵因为北方祖宗陵园地区失陷，已故皇帝只在绍兴选择陵园浅埋，称为“攒宫”^[50]，期待收复失地后重新



图六 唐乾陵平面示意图

（采自刘毅：《中国古代陵墓》第9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图七 宋永泰陵平面实测图

（据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图七改绘，《考古》1964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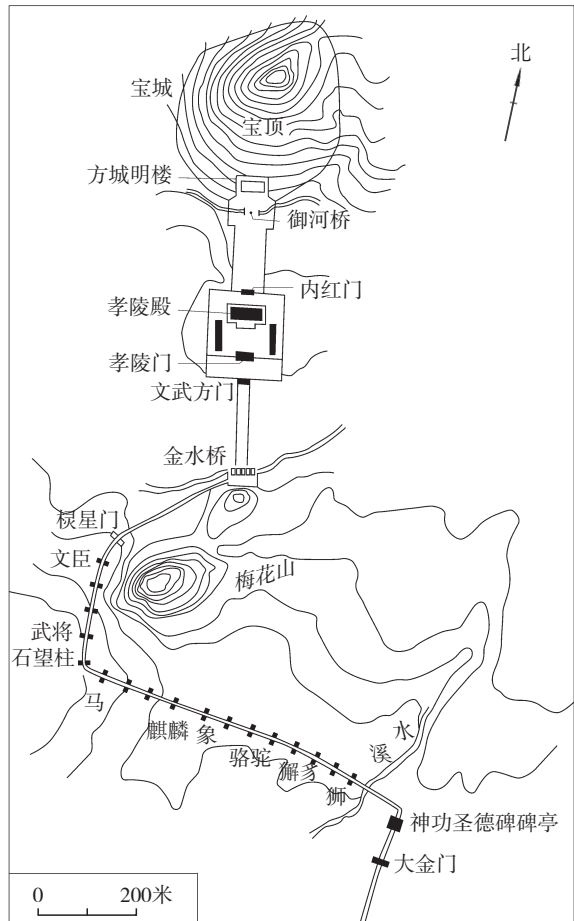
进行埋葬，其陵园布局基本与北宋相仿。或许是由于宋代皇室普遍崇信“五音姓利”，并以此作为帝陵选址、陵园布局、建筑规制的重要依据^[51]。

辽与金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其中辽代帝陵多以山为陵，陵前建有享殿以祭祀，置奉陵邑和守陵户^[52]，显然是深受唐代陵寝制度的影响，是对汉文明的接纳与传承。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发掘资料，金陵陵区的选址不同于唐宋和辽代，位于深山之中，符合女真人早期的原始性^[53]；但其陵区布局体现出汉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中轴对称，且陵园建筑融入了佛教因素，整体而言，辽金帝陵陵园深受汉化影响^[54]。

西夏王陵的塔式陵台前有献殿，用于供奉献物及祭奠，有的帝陵还有封闭式、马蹄形式和附有瓮城的外城^[55]。总体而言，西夏王陵陵园的基本格局是在效仿北魏、唐宋皇陵规制的基础上加入了佛教色彩，同时又融入了游牧民族自身的葬俗^[56]。

明清帝陵与之前唐宋时期帝陵相比，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在陵园建制方面，首先是平面由方形变成长方形，其次是取消寝宫的建筑，扩大祭殿建筑^[57]。明十三陵与后来的清东陵、清西陵，基本上都是按照明孝陵的格局建成，变化不大（图八；图九）。究其原因，这种后代陵寝制度对前代不约而同的效仿，一是政权确立初期必然需要一套约定俗成并被广泛认可的文化体系来稳定和巩固其正统地位；二是自汉文明最终确立以来，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产生一定的冲击，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会顺理成章的在反应当时人们尊崇的核心价值观的物质文化载体——陵寝制度上影射出来。

综上所述，帝陵陵园的建造经历了由简而繁、由盛而衰而又复兴的反复过程，期间帝王个人观念、战争、地理条件、宗教环境、民族传统等客观要素使得独立陵园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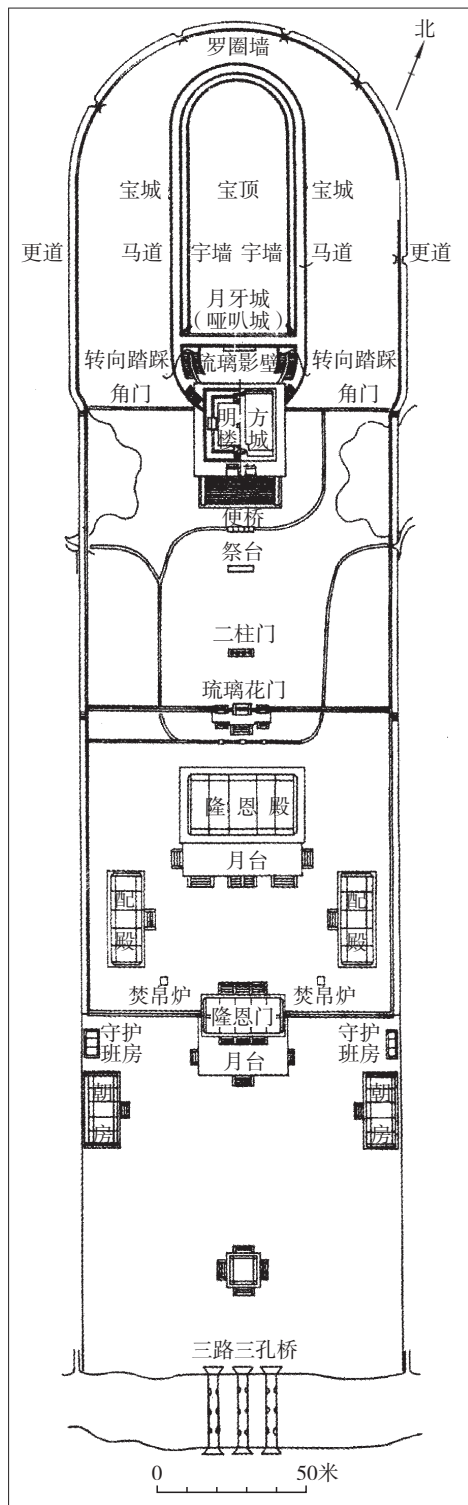
图八 明太祖孝陵平面示意图
(采自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第291页，开明出版社，2016年)

进一步发展中出现诸多变化或创新。

五、结 语

独立陵园制出现于族葬意识削弱、君主专制强化的战国中后期；确立于帝国构建、大一统国家概念被广泛接受和固定的秦始皇时期；发展于力求以制度变革和国家主导文化的改造来谋求长远发展的西汉时期；简化于整个社会环境变动不安的东汉至十六国时期；恢复和复兴于南北对峙相对稳定而后统一的南北朝至隋代；大发展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相继传承于两宋及其以后。

作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图九 清孝陵陵园平面图

(采自刘毅：《清朝关内九陵园制度研究》第115页图6，《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辑，现代出版社，2011年)

分，独立陵园制是三观架构下帝国文明的发展剪影。它的出现、确立、发展、简化、复兴和传承无疑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更是象征着各个时期自上而下的价值观念构架，间接投射出从王国到帝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螺旋上升式演进。其发展脉络中呈现出的多样性是由各阶段社会治理体系中各自的独特性所造就，而其前进过程中体现出的共通性则源自在王莽时期构建完成的汉文明。

注 释

- [1] 李玉洁：《试论我国古代棺椁制度》，《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 [2]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第786页，中华书局，1980年。
- [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00~1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b. 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c.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 [4]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第786、787页，中华书局，1980年。
- [5] 赵化成将独立陵园制的特征总结为四点：陵园独立化、陵区规模化、设施复杂化、功能完善化。参阅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
- [6] a. 张海云、骆希哲：《秦东陵勘查记》，《文博》1987年第3期。
b.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c.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d.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 [7]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

- [8]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23~294页,中华书局,1963年。
- [9]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第205~2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 [10]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08页的相关记载,中华书局,1963年。
- [11]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第200~211页。
- [12] 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3]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第200~205页。
- [14]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第3~4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 [15]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 [16] 黄景略、叶学明:《中国历代帝王陵墓》第81~98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
- [17] 刘士莪、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
- [18] 同[7]。
-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2013年第11期。
- [20] 段清波:《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 [21] 段清波:《汉长安城轴线变化与南向理念的确立——考古学上所见汉文化之一》,《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 [22] 段清波:《先秦时期宇宙观与政治实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24日第5版。
- [23] 李零:《铄古铸今》第63页,三联书店,2007年。
- [24] a.朱艳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上榜》,《洛阳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b.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第16~10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 [25]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36~42页。
- [26] 贺云翱、郭怡:《古代陵寝》第154~157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
- [2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安阳高陵陵园遗址2016~2017年度考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8年第1期。
- [29] a.徐吉军:《中国丧葬史》第288~315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b.严辉:《曹操墓和曹休墓的比较与研究》,《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5版。
- [30] 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以及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
- [31] [唐]房玄龄等:《晋书·帝纪》第20页,中华书局,1974年。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 [33] 王重光:《中国帝陵》第1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34] a.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b.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c.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
- [35] [唐]房玄龄等:《晋书·载记》卷一百五第2751页、卷一百二十三第3090页,中华书局,1974年。
- [36]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36~42页。
- [37] a.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第8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b.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文物》1994年第11期。
- [38] a.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b.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c.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 [39] [唐]许嵩:《建康实录》第2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40] 同[38]c。
- [41] 刘毅:《中国古代陵墓》第7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 [42] 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第366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 [43] 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 [44] 刘毅：《中国古代陵墓》第8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 [45]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
- [46] 贺云翱、郭怡：《古代陵寝》第21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 [47] a. 新政县文化馆：《新政县后周皇陵》，《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4期。
b. 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第7~39页，文物出版社，1957年。
c.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1~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d.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第3期。
e. 商承祚：《广州石马村南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
f. 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82年第3期。
- [48]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
- [49] 冯继仁：《巩县宋陵献殿的复原构想》，《文物》1992年第6期。
- [50] 刘毅：《南宋绍兴攒宫位次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 [51] 冯继仁：《论阴阳勘輿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文物》1994年第8期。
- [52]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
b. 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
c. 李逸友：《辽庆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 [53] 徐萃芳：《上京的金代皇陵》，《北京文博》2007年第3期。
- [54] 邵海波、吴敬：《辽代契丹人与金代女真人汉化过程的对比研究——以陵墓材料为线索的考古学观察》，《草原文物》2011年第2期。
- [55] 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见《故宫学刊》第8辑，故宫出版社，2012年。
- [56] 余军：《西夏王陵对唐宋陵寝制度的继承与嬗变——以西夏王陵三号陵园为切入点》，见《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 [57]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66~69页。
(责任编辑 刘昶)

○信息与交流

《花树摇曳 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简介

《花树摇曳 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由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发行。本书为大16开精装本，共427页，定价480元。

本书为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萧后冠的实验室考古清理与保护工作取得多项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成功揭示了萧后冠头箍结构、博鬓、花树数量与分布，

以及铜钗、钿花等饰件制作工艺；发现了隋唐时期的棉花；对古代鎏金铜珠工艺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完成了对萧后冠的仿制工作；为隋唐时期礼冠制度及其复原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技术资料。该项目研究是目前实验室考古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该书的出版对国内实验室考古探索和实践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伊 铭)

本期要览

陕西旬邑县枣林河滩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简报 2016年,对枣林河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商周时期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一百余处,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及铜器。该遗址商周遗存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殷墟三期至商末周初阶段,文化面貌与长武碾子坡遗址较为相近。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区域文化格局及周文化形成过程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河北涿鹿故城遗址2号战国墓发掘简报 2017年,对涿鹿故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在靠近西城墙的城址中部清理两座被破坏的战国时期墓葬,其中M2墓室保存基本完好,墓葬形制较独特。墓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包括数量较多的铜器、陶器、玉石器以及少量骨器。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M2应为战国早期到中期的燕国贵族墓葬。

辽宁大连市营城子汉墓群2003M76的发掘 2002~2010年,对大连营城子汉墓群进行发掘,清理汉魏时期墓葬200余座。其中,2003M76为贝壳与砖、瓦、石块混筑的单室墓,双人合葬,出土金带扣、铜承旋、鎏金铜印、玉剑珣以及陶器等随葬品。其中金带扣和铜承旋为东北地区首次出土,推测墓主人有较高身份。墓葬年代应为西汉晚期或新莽时期。

欧亚大陆视野下的史前早期雕塑 从目前发现看,雕塑艺术源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并可能影响西亚雕塑的出现。中国早期雕塑的出现可能受到了欧亚大陆西部的影响。以雕塑、仪式空间和特殊埋葬行为等为依托的象征体系促使文化传统的建立和社会整体性的维持,并促使更加复杂的社会形成,在欧亚大陆东西方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方向。

帝国体制下独立陵园制的发展演变 墓葬是人们生死观和丧葬观的体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复杂化,受丧葬观念变化的影响,墓葬形式和规模也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应对变化。出现于战国后期的独立陵园制,是伴随着中国古代从王国向帝国社会治理体系转变而出现、发展和完善的。西汉后期至新莽时期,汉文明的确立使得此后两千年独立陵园制在古代中国成为常态。